

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对城市的侵害^{*}

吴 鹏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中古德意志皇帝并不总是德意志城市利益的担保人,城市也不是皇帝忠实的拥护者;皇帝和诸侯一样,对城市的态度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都曾对城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害。皇权和诸侯对城市的侵害:一是在武力上威胁和摧残城市;二是把城市排斥在帝国议会之外;三是打压和抑制城市同盟的发展;四是对城市的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掠夺。

关键词:中古德意志;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侯;德意志城市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5)S1-0135-04

作者简介:吴 鹏,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于中世纪欧洲王权、城市和诸侯之间关系的研究,传统学术界一方面强调了诸侯与城市之间的敌对性,以及诸侯与王权之间的对抗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市民与王权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和市民与王权结盟对于构建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普遍的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因素。”^{[1]167}因而中世纪欧洲的王权和市民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可以建立“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于其中的”君主国^{[2]444}。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城市自身面临的来自王权和诸侯的侵害和打压。在中古德意志,城市和王权的关系并没有像英吉利和法兰西那么密切,也远没有达到通过和王权合作的方式建立起集权国家的程度;城市与皇帝虽然也建立了结盟关系,并获得过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非常稳定的联盟关系。因为皇帝并非总是维护城市的利益和支持城市的权利等诉求^①,而城市在追求自治权和维护城市利益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和封建主进行着斗争。

本文就着重分析中古时期德意志城市遭受到的来自皇帝和诸侯的侵害。

一、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在军事上对城市的打击

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以军事打击的方式对城市造成伤害是常有的事情。此外,诸侯也曾经利用其他势力来反对城市;“事实上,城市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诸侯雇佣这些团体^②去反对市民。”^{[3]195}不仅如此,皇帝和诸侯都曾一致抵制城市与城市之间建立的同盟。

德意志文策尔皇帝时期,莱茵河中游的施佩耶尔在1380年组织了一个新的城市同盟——莱茵同盟,由于和士瓦本同盟有着共同的目的与敌人,二者于1381年7月17日完成了联合。但是文策尔皇帝与诸侯一样反对这类强大的组织。“为了进行对抗,文策尔和诸侯们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同盟,其目的在于阻止其领地上的城市同盟组织之进一步发展,并联合起来相互保护。1381年9月,在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起草了一项‘普遍和平提案’,根据该法案,城市

^{*} 收稿日期:2015-05-10

^① 计秋枫认为在德意志地区,城市虽然获得了特许状,但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得到皇帝多少实际的支持。参阅计秋枫:《市民社会的雏形:中世纪欧洲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历史作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赫伯特·格隆德曼也指出在斯陶芬时期,“虽然年轻的德国城市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欣欣向荣,但在争取自治和缔结城市联盟方面却与诸侯的权力发生冲突,而很少得到国王的支持。”参阅赫伯特·格隆德曼:《德意志史:古代和中世纪:第1卷(下)》,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丁建弘认为城市在与封建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斗争的过程中,德意志皇权不但不支持城市的这种斗争,而且还经常以打击和掠夺城市、聚敛财富为目的。参阅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7-38页。

^② 指随着士瓦本同盟势力的增长,封建主建立了与之相对立的组织——贵族联盟以及骑士建立的一些骑士联盟。参阅赫伯特·格隆德曼:《德意志史:古代和中世纪:第1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55页。

势力应该被摧毁,城市的士兵应该遣散到帝国各地去。”^{[4]196}于是,城市的力量就遭到皇帝的打压,城市的利益也没有得到皇帝的保护。

1388年施瓦本同盟和莱茵同盟组成的城市联合军,在美因茨大主教、勃兰登堡边地侯和条顿骑士团的联合攻击下最后瓦解了。与此同时,文策尔皇帝却并没有体现出援助城市的行动,反而在1389年向人民宣称:施瓦本同盟的建立是“反对上帝、反对皇帝、反对帝国、反对法律的。”^{[4]200}在皇帝和诸侯的斗争、博弈与妥协中,皇帝有时候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帝国城市抵押给该城市附近的贵族。这说明,在皇帝眼中,城市不过是自己可以支配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城市只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

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期,帝国城市因为和皇帝对宗教改革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立场,所以与皇帝的结盟破裂了。随即而来的结果是:“65座帝国城市中的大多数(超过了50座城市)都通过某种官方形式,承认了宗教改革”,而城市同盟原先的盟友兼领导者——哈布斯堡王朝却变成了“入侵城市的力量。”^{[5]41,104}

在中古晚期,强盗骑士和一些乡村贵族也对城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①。尽管乡村贵族的打劫和勒索给城市的某些市民带来痛苦和不幸,但与诸侯所带来的威胁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诸侯一旦征服城市,就有可能剥夺整座城市的自由;况且,诸侯的力量和破坏力又远非那些强盗和骑士所能比拟的。在诸侯强大势力的威胁下,一些城市要么暂时失去了其独立的地位,要么永远失去了独立的地位^{[3]14-15}。

据了解,德意志诸侯反对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财富和特权的日益增加,“破坏了地方行政区域的统一,削弱了王公诸侯们的直接行政权威。”^{[6]91}更何况,“城市的商品经济基础与领主权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7]69}在14世纪晚期的德意志,莱茵地区的多数城市都受到诸侯邦国的压力,只是在程度上要比施瓦本同盟的城市稍微轻一些。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南部,城市“最危险的敌人是巴伐利亚公爵、符腾堡伯爵,而最主要的却是哈布斯堡家族。”^{[4]256}始于1388年城市与诸侯之间的战争,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直到双方打得精疲力尽之后才重开恢复和平之路。”^{[4]262}城市与诸侯的冲突在于:城市的扩张损害了诸侯邦国的利益;而诸侯希望加强对城市的管辖权甚至把一些帝国城市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15世纪中期,城市同盟与诸侯同盟之间的斗争(即“第二次城市战争”)以及这次冲突的失败,导致城市联盟被粉碎了;在这之后,城市和诸侯的冲突就变得更加频繁了。^{[8]104-115}“诸侯们竭力压制城市的发展,要求它们在财政和经济上为自己效劳,为此不惜向城市发动进

攻……1462年,美因茨第一次丧失了帝国直属城市的资格。1458年,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占领了多瑙沃尔特并进逼雷根斯堡。此外,韦丁家族连续征服邻近的奎德林堡”^{[9]80}

二、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在帝国议会上对城市的排斥

德意志帝国议会在15世纪末建立之后,就逐渐成为了皇帝和诸侯维持各自利益的舞台。诸侯通过操纵帝国议会而做出不利于帝国城市的各种决定,如:不想赋予城市参加帝国议会委员会、对立法提出议案和建议、在上议员享有表决权的权力等等。尽管帝国城市在15世纪70年代开始组成帝国议会城市院,但在帝国执政委员会的20名代表中,城市仅仅占有两个席位,而且还必须在4个配对的大城市中轮流^{[10]330}。城市多次试图争取获得参加帝国会议的权力,但是常常遭到诸侯们的否定,如查理五世(1519—1556在位)时期帝国会议上针对大商行和自由城市的反对运动以及1522—1523年纽伦堡会议没有通过城市参与会议表决权的申请等。尽管“在13世纪中叶,城市就已经在国王荷兰的威廉统治时期第一次出现在帝国议会之上;在后来,同盟参加帝国议会的讨论和决定还一直是不规则的和没有合法的基础,直至15世纪末一般往往不被邀请;如果被邀请,那么大多是实际原因决定的,特别是当帝国出现强迫局面需要它的合作之时……因为国王和各等级拒绝它们参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才有所改变,这时德意志的城市才称得上获得了参加帝国议会的权力^{[4]528,550}。

三、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对城市同盟的打压

德意志路德维希四世死后,由他倡导的与城市之间的同盟也随即瓦解。除了康斯坦茨、苏黎世、圣加路退出之外,其余的19个城市又组建了另一个同盟,约定相互保护并在承认新皇帝时维护共同利益。1350年5月查理四世以城市和贵族同盟取代了这个同盟。在1356年的《黄金诏书》中,查理四世“不仅不承认市民成分,而且还禁止建立任何城市间的联盟和同盟;禁止个人间或个人与城市间的联盟,除非是在他权力直接控制下组织的‘国家和平同盟’”^{[4]191}。“1359年,查理四世制定了第三个全面和约。这一和约使同盟处于帝国法庭的直接管辖之下。”1370年,查

① 15世纪末和16世纪早期成了贵族抢劫的黄金时期。1499年,有一个名叫古茨·肖特(Cuntz Schott)的法兰肯尼亚强盗骑士绑架了一些纽伦堡市民,砍下他们的手来收取赎金。参阅 Thomas A. Brady, Jr., The Politics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Jacob Sturm (1489—1533) of Strassbourg, Humanities Press, New Jersey, 1997, p. 26。还有一次,他砍下纽伦堡的一位城市议员的右手,然后警告城市里的人以后要对他古茨要放尊敬点。参阅 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5, p. 14。

理四世又领导组建了士瓦本全地区的“国家和平同盟”,后来因为城市与贵族关系的恶化,在1373年被新的“国家和议”同盟所取代。^{[4]191-193}在1389年5月5日,皇帝在埃格尔颁布了全帝国的普遍和平盟约。“各地区集团(为数8个)应选派代表,与皇帝一起解决对抢劫、屠杀、纵火、俘虏和不公正行为的一切指控,并执行惩处。为此目的,这些代表每年将会晤四次。所有其他同盟则被禁止。”^{[4]200}皇帝的这一禁令,最终造成了施瓦本同盟的完全瓦解。施瓦本同盟的建立被认为是“反对上帝、反对皇帝、反对帝国、反对法律的”。由此,各个城市纷纷和自己的对手和解,接二连三地加入了由皇帝倡导的总同盟中。^{[4]200}

皇帝的议和政策,再加上各个城市之间对城市同盟态度的差异,使得城市参与控制帝国政治的努力付之东流,在议会中只有帝国城市的地位和代表权得到宪法的承认,而其他自由城市却被议会排斥在外。有证据表明:在战争面前,各个城市的立场并不是相当一致。“当施瓦本的各帝国城市在好战的乌尔姆的领导下,毫无畏惧地不惜拿起武器去反对诸侯的威胁,以保卫他们直属于帝国的管辖关系时,几个大的商业城市如奥格斯堡和纽伦堡首先重视的却是如何保障和平。”^{[10]256}城市的这种举动,再加上皇帝的这种狡猾的让步就很容易“引起城市同盟的分裂,同时也使留在帝国议会中的城市为数无几,以致他们的影响微不足道。”^{[4]201}

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在中古晚期的德意志,城市同盟是确保帝国城市免遭诸侯侵略和维护自身独立的最为有效的方式。”^{[11]359}但是城市之间建立的同盟有时却会遭到抵制和不同程度的瓦解。始于1449年,为期5年的战争是城市联盟与诸侯联盟的战争。诸侯不仅独自进犯帝国城市,使城市处于他们的掌握之下,还在帝国会议上集体对城市施压,抵制和反对城市争取权力的行动。许多中小贵族,特别是一些乡村贵族和强盗骑士,多次劫掠了城市。帝国之外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勃艮第公爵彼得·冯·哈根巴赫(Peter von Hagenbach)和大胆查理,对南德帝国城市的生存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就像奥格斯堡编年史家布卡德·清克(Burkard Zink)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帝国城市)现在彼此分裂了……就像一群没有了牧羊人的绵羊一样的无助……罗马皇帝,我们天然的主人,一点也不眷顾它们,任凭贵族们随心所欲地欺负它们……它们的力量、它们的强大、它们的领地,这些它们拥有很久东西,如今已经荡然无存。”^{[12]228-229}

四、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对城市财富的掠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正如被一头圈养的奶牛,经常遭到皇帝和诸侯的压榨和剥削。城市所遭受到的这种剥

压,无疑是有碍于城市的发展和成长的。早期的莱茵同盟曾经拒绝过弗里德里希二世要求解散同盟的命令,并宣称“我们许多市民在国内和商道上被暴力和邪恶势力折磨得倾家荡产……”^{[12]91}有资料证明,皇帝对城市的经济索取是非常庞大的。城市曾经给予皇帝大量的且具有高风险的贷款,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当皇帝不能如约还给城市银行家金钱时,城市往往会陷入困境之中;尽管城市通过给予皇帝贷款,自己也得到了好处,比如:皇帝给予城市开采铜矿、银矿等矿藏的权利,把城市的银行家封为贵族等等。当城市的给予皇帝的贷款难以收回时,不仅会导致城市银行家的破产,也会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甚至是使城市失去原有独立的自治地位。“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统治时期,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为皇帝的贷款而失去独立,这远比因诸侯的威胁和军队而失去独立要多,其中许多从来都没有重新获得过失去的独立。”^{[3]64}等到马克西米利安去世时,他还欠着许多城市大量的债款。有资料表明,他共欠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巴塞尔、奥格斯堡、施佩耶尔、沃尔姆斯、科隆、乌尔姆等帝国城市10万弗洛林的债务^{[10]82}。他还不断地向南德帝国城市中的银行家们借钱,奥格斯堡几乎成为了马克西米利安非正式的资金库^{[14]17}。为确保查理五世当选为皇帝,福格尔家族向哈布斯堡家族提供100万弗洛林的贷款^{[15]127}。1512—1518年,福格尔家族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提供给了皇帝。到马克西米利安去世时,他欠福格尔家族130万弗洛林,欠保姆加纳特(Paumgartner)家族23万弗洛林^{[16]277}。

学者们一般认为国王授予城市特许状是有利于城市经济和商业发展的。但是有学者的研究指出,这种看法过分强调特许状的作用了。实际上,国王颁布特许状是为了将城市的商业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特许状中对城市商业行为进行了空间与时间上,甚至是交易过程上的限定;因而特许状对城市经济和商业的推动作用是以限制为前提条件的;而且城市的特许状只不过是国王批准授予众多特许状中的一种。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大都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的,国王并没有那么的慷慨和仁慈^{[17]101-113}。

此外,德意志诸侯也不同程度的索取着城市的财富。诸侯也“利用一切可能,限制等级代表的自主地位,迫使城市在财政和经济上为其效劳。”^{[18]42}诸侯对城市的经济掠夺,主要通过设立各种名目的捐税。实际上,“世俗和教会的封建贵族实际上并没有以武力劫掠贸易,同盟强行征收通行捐税,对贸易造成的压制,也无异于剥夺。”^{[4]182}有资料表明,一些诸侯会定期派人去向城市“借钱”,如普法尔茨选侯胜利者弗里德里希(Frederick the Victorious)就派人向莱茵地区的大城市去“借钱”^{[19]117-118}。为获得城市的财富和潜在的军事力量,一些家族则与某些城市形成了敌对关系,甚至长期地成为了世仇。如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边境侯爵

和纽伦堡,符腾堡的诸侯们和埃斯林根之间就长期结怨^①。

五、结论

中古德意志城市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处境之下。城市不仅在军事上承受着皇帝和诸侯的打压;在帝国会议上也难以得到发言权;城市为保护自身而成立的联盟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压制;城市的财富也难以获得有效地保障。因此,在探讨中古德意志城市与王权关系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到二者结盟的关系,还要考虑皇帝对城市不利的方面。另外,诸侯对城市的打击也是不可忽略的。

参考文献:

- [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3] [美] 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5.
- [4] [美] 詹姆斯·W. 汤普逊. 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史[M]. 徐家玲,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5] [德] Moeller, Bernd.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Three Essays. translated by Midelfort, H. C. Erik and Edwards, Mark U. Jr. Durham: The Labyrinth Press, 1982.
- [6] [美] 埃里希·卡勒尔. 德意志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7] 哈全安. 论中世纪德国“市民城市”商品经济与法律地位的关系[J]. 世界历史, 1989(6).
- [8] K. Jordan. Herrschaft und Genossenschaft im deutschen Mittelalter[M]//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12. 1961.
- [9] 郑寅达. 德国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0] [德] 赫伯特·格隆德曼. 德意志史:古代和中世纪:第1卷(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1] 钱金飞. 宗教改革前期南德帝国城市与王权的结盟[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3).
- [12] 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5.
- [13] 丁建弘, 陆世澄. 德国通史简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14] [德] H. L. bling, Water, Maximilian I und sein Verh Ituis zu den Reichsst • dten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z, 1970.
- [15] [德] B. • renger, Jean.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273—1700 [M]. translated by Loman, C. A. Simpson,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4.
- [16] 朱孝远. 近代欧洲的兴起[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 [17] 赵立行. “限制”还是“促进”: 特许状与欧洲中世纪商业[J]. 历史研究, 2009(6).
- [18] 丁建弘. 德国通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9] Henry J. Coh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hine Palatinat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M]. Oxford, 1965.

(责任编辑:陈伟)

^① 参阅 Emil Reicke, Geschichte der Reichsstadt Nürnberg, Nuremberg, 1896, 404-435, 462-476, 492-506, 537-539;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66. P. 51-52, 54-55.; Otto Borst, Geschichte der Stadt Esslingen am Neckar. 3d. ed. Esslingen, 1978. , p. 171-196.